



青海人民出版社

谭五昌 主编

2016年中国新诗
○ 排行榜



中国新诗排行榜

谭五昌 / 主编

相对于2015年而言，

2016年的中国诗坛整体上呈现出平稳的态势与格局。

2015年度，在一些具有新闻效应的诗歌事件于诗坛内部引起

广泛论争与大众强烈关注的喧嚣之后，无论诗界人士还是大众读者，

都渐渐平静下来并开始回归到诗歌创作、阅读与批评的正常状态。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6 年中国新诗排行榜 / 谭五昌主编.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225-05387-5

I. ①2… II. ①谭…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0765 号

2016 年中国新诗排行榜

谭五昌 主编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青海雅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1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30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387-5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16 年中国新诗排行榜》编委会

主 编

谭五昌

副主编

远 岸 唐成茂 许耀林（澳大利亚）

编委（排名不分先后）：

吉狄马加	叶延滨	曾凡华	潞	潞	梁 平	梁尔源
张 清华	商 震	树 才	高	兴	臧 棣	李少君
黄亚洲	高 凯	祁 人	周 庆	荣	龚学敏	侯 马
车延高	潇 潇	庄伟杰	阎	安	阎 志	马 非
姜念光	谷 禾	潘红莉	马铃薯兄弟	石	厉 冰	峰
鲁若迪基	沙 克	徐忠志	刘	耿 雁	西 刘	川
洪 烛	张 民	喻子涵	李	强	唐 诗	唐德亮
田 禾	顾 北	韩庆成	罗	晖 卡	西 南	鸥

2016 年中国新诗之一瞥

谭五昌

相对于 2015 年而言，2016 年的中国诗坛整体上呈现出平稳的态势与格局。2015 年度，在一些具有新闻效应的诗歌事件于诗坛内部引起广泛论争与大众强烈关注的喧闹之后，无论诗界人士还是大众读者，都渐渐平静下来并开始回归到诗歌创作、阅读与批评的正常状态。2016 年度的整个诗坛依然呈现热闹兴旺的景象，各种诗歌活动依然接踵而至，各种性质的诗歌选本也相继纷纷亮相，虽然编者的审美趣味、诗学理念各不相同，选本风格各具特点，但编者们的持守的民间、官方、学院等编选立场与文化格局与以前大致相同，基本不变。此外，各种名目与层级的诗会、诗歌节、诗歌论坛也依然在两岸四地频繁展开，参与的诗人与评论家为数甚多。再者，各种名目、层级、宗旨与性质的诗歌奖项（如海子诗歌奖、昌耀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李白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中国青年诗人奖、两岸桂冠诗人奖，等等）也在整个华语诗坛如火如荼的颁发与举行，并且也大致维持着官方奖、民间奖、学院奖的奖项性质与评奖格局。

因而，与 2015 年一脉相承，2016 年的中国新诗创作同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态势与局面。从宏观的美学风格与价值取向层面着眼，本人把 2016 年度的诗歌创作大致归纳成七种主要的写作向度。现分别简要论述之。

向度之一：关注现实与时代状况的非虚构写作

持守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诗人最为优良的精神传统之一，从屈原，到杜甫，到艾青，到北岛，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传统从古至今，绵延不绝。诗人们在诗歌写作中关注现实问题与时代状态，不逃避，不隐藏，不伪饰，展示出了诗人们直

面现实的可贵精神与真诚、勇敢的历史担当意识，诗人作为社会良知代言人的光荣伦理角色由此得以自我建构与巩固。

关注重大、敏锐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时代现象，依然是不少当代诗人的诗思焦点与表现兴趣之所在。许多诗人在诗歌写作中表达了对于当下生存环境日趋恶化的深沉担忧，严力在《把水烧醒》一诗中对人们乱砍乱伐树木导致环境恶劣的严重现象予以了鲜活、生动的艺术性描绘，其现代性的反讽手法与现实批判精神的有机结合，极大地彰显了该诗干预生活的艺术力量。谭践的《雾霾传》继续展示了近几年来全体社会人员对雾霾问题与环境恶化现象的高度关注，作者用亦庄亦谐的叙述口吻凸显其环境保护意识，发人深思。高凯的《经过县城》与孙晓杰的《废墟里的挖掘机》则共同对当下城乡强制性的房屋拆迁社会问题，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高凯诗作的语言平实朴素，暗含委婉的讽刺语气；孙晓杰的诗作则构思精巧，角度新颖，从拟人化的挖掘机角度表达生存之忧思。与此相似，郑小琼的《拧紧》、花语的《火车开过田村》、华海的《钢铁敲击的……》等诗人诗作，则把社会现实关怀的目光直接投注到底层人民的身上。郑小琼在《拧紧》中用“铁螺丝”这一典型意象鲜明而生动地揭示了后资本时代底层农民工的残酷命运。花语与华海则在他们的诗作中运用“钢铁”的意象，在象征层面上有力的揭示了工业化进程中大机器生产方式对底层工人命运的无形碾压，两首诗作的语调外表平静，但内在情感深沉。青年诗人马晓康在其诗作《大工业时代，请原谅我抬高了心跳》中对我们这个工业化进程空前加剧的时代进行了有效命名，并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象与修辞方式，传达了一种淳朴的忧伤情绪。

此基础上，有些诗人表达了更为强烈、自觉的现实关怀精神与社会责任意识，精神视野也更为开阔。例如，许耀林的诗作《诅咒战争》直接以当下在国际上流

行的恐怖主义威胁与局部动荡地区的战争现象作为表现主题，作者态度鲜明，义正词严，语调铿锵，充满阳刚之气。徐柏坚的诗作《让孩子们学会善良》也姿态鲜明地表达了热爱和平的时代主题，只是诗人说话语气温柔，充满纯粹的抒情色彩。杨克的《脱欧》以时下欧盟内部分裂的国际新闻事件为关注点，诗人以表面漫不经心的调侃与反讽语气来表明自己对于国际时事的态度，情感故作暧昧，言此意彼，引人玩味并沉思。伊沙的《吉隆坡云顶赌城联想》一诗更是国际视野与奇思妙想的结合体，作者以科学幻想外加戏剧性的表现手法，以幽默的话语，揭示了地球的生存危机，由此呈现出了诗人对于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内在忧思，令人警醒。

与一些诗人直接关注现实与时代状况、表现重大社会主题的思维取向有所区别，有些诗人则更多关注现实生活中个人的生存境遇，或者关注人们的集体生存境遇。叶延滨的诗作《抉择，做个好蛋还是坏蛋》非常敏锐地触及到了现实生活中极为常见的、非此即彼的抉择现象，诗人以轻松戏谑的语言方式，叙述了自己及自己的同类在二难选择中的种种尴尬情状，以黑色幽默的效果呈现了现实人生的困境主题。与此类似，吕约的《头顶的声音》以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噪音污染给自己的写作带来困扰为表现内容，诗人以举重若轻的戏谑语言与反讽手法来叙述理想与现实对立带来的巨大心灵落差，给读者以强烈的情绪感染与精神共鸣。卡西在诗作《我不想用曾经的方式面对现实生活》中则以心灵坦白的手法，以质朴的审美趣味，在现实生活之外建构了一个属于诗人自己的精神乌托邦。与叶延滨、吕约等诗人对于现实生存困境的自我心理分析手法略有不同，有些诗人则倾向于直接表达外在世界投射于自我的内在感受，例如谢克强在诗作《醒着》中直接抒发诗人自己为苦难世界分忧解难的真诚情感，洪老墨在诗作《2016年第一场雪》中借助于一场雪景的描述，坦诚的表达诗人对于当今世道人心不古的社会忧虑，

而大枪的《夏至，热度及其他》则以如何逃避酷夏这一社会大众普遍感兴趣的话题，作为诗歌的题材与主题，诗人对于酷夏场景充满艺术想象力的生动描写，大大缓解了大众读者对于酷夏的畏惧心态，从而彰显出艺术对于现实进行干预与超越的独特审美力量。

向度之二：以民族历史与个人经验为表现内容的记忆写作

我们对于诗歌写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持肯定态度，但从文学写作的本质来看，写作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写作者对自己生命历程与情感记忆的一种语言形式的再现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讲，诗歌写作就是以语言与意象为载体的记忆写作，它是对人类思想与情感经历事后沉淀与提纯式的书写行为，具有丰富的精神信息与很高的审美价值。因而，记忆写作为诗歌写作（包括一切文学写作）带来一种特殊的魅力，它能传递出许多富有价值的情感与思想信息。

记忆一般指向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与个体记忆，诗人们的记忆写作常常也是围绕这两个维度展开。具有历史情结的诗人，其往往对于民族历史上那些重要的人与事具有强烈的兴趣与深厚的情感，或生发出怀古之幽情，或寄托某种现实感触。姚风的《谒屈子祠》以屈原为追慕对象，在对古代伟大诗人的缅怀崇仰之情的背后，流露出诗人（作者）本人对于现实的某种不满情绪。龚学敏的《在洋县龙亭镇谒蔡伦墓词》对于蔡伦所表达的仰慕之情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赞美之情水乳交融在一起，诗人所运用的长句形式恰如其分的表达出其对于中华民族灿烂历史文化的尊敬情感，做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与此类似，蔡天新的《海瑞》、育邦的《赵孟頫》也是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为追思对象，二位江南诗人以朴质而灵动的诗句，颇为传神地再现了对二位历史人物的精神想象。洪烛的《时光倒流》以仓央嘉措的爱情传说为主体表现内容，诗人运用优美的想象与生动地叙述，勾

勒出了一代情诗王子的传奇人生与其美轮美奂的内心情感世界。雪丰谷的《芍药圃想起云丫头》以清朝才子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里的人物作为情思对象，简洁有味的语言，生动的场景描述，洋溢着某种与曹雪芹时代相对称的才子气息。与前面几位诗人的有具体指向性的历史怀古有所不同，郭新民的《蟋蟀罐》通过一只穿越历史的蟋蟀，对整个民族历史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与反思，作品角度巧妙，以小见大。祁人的《登江心屿》是对无数历史人物的集体缅怀与凭吊，诗人登江心屿的动机并不完全怀古与崇古，而是与历史人物进行想象中的心灵对话，幽远的思绪与真情的坦白，让全诗充满抒情的气息。而杨东彪的《矗立的文字——致鲁迅》与皇泯的《徐志摩墓，饮泉水濯洗的诗》则把历史怀古拉近到现代文坛人物，杨东彪诗作的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阳刚之气沛然于天地之间，与鲁迅形象完全对应。皇泯诗作的语言则是清新灵动，情调浪漫唯美，与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形象相匹配。苏历铭的《过青年路》则以诗人路过青年路的见闻与联想为灵感触发点，用充满内在激情的语言方式，为读者打捞起 20 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记忆。

上述诗人们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实质上更多是一种历史想象的书写，因为诗人们对于自己所书写的历史人物、事件与情景并无亲身体验，主要来自于相关历史知识。因而，许多的诗人更喜欢书写自己的个人记忆，因为这是属于他们自身的生命经历与情感体验，是深入骨髓与灵魂的，其写作的内在驱动力也就更为强大。在以个人经验为表现对象的记忆写作中，对童年记忆与乡村经验的书写比较普遍，这是因为诗人们对于童年的记忆最为深刻与最为美好（它符合人类的天性），同时还因为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具有乡村背景。

田禾的《白事》对诗人童年时代奶奶的葬礼予以了生动的描述，诗中的细节

暗示出奶奶贫穷到骨的悲惨与凄凉，朴实无华的语言，沉重的情绪氛围，令人过目难忘。高旭旺的《瓦雨》一诗在立意上与田禾较为接近，诗人描述了童年记忆中乡村老屋的一场雨景，该诗通过母亲的话语来刻画家庭的贫困，优美、细腻的场景描写与悲哀的情绪体验构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陈树照的《歌谣》也描述了童年时的一个片段，朴素的民谣式语言，有意无意地触及苦难体验与死亡体验，作品苍凉沉重的情绪氛围给读者以渗透性的感染力。

刘频的《李二花，给你一颗糖吃——1973年纪实》将童年回忆的时间点定格在“文革”年代，诗作叙述了诗人小时候与伙伴们对一个疯女人的戏耍场景，口语化的语言读之令人感觉亲切，该诗最出彩的地方是那个疯女人面对小孩子们要求她喊反动口号时主动放弃美食的诱惑，以及突然的清醒与恐惧，由此传达出了那个特定年代的政治高压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伤害，发人深思。此外，杨廷成的《牙合村记》与商泽军的《大崇庄的十字街》都是对于童年时代乡村生活记忆片段的诗性书写，二位诗人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与其淳朴动人的乡村情感相得益彰。与田禾等诗人忧伤、沉重性的童年记忆与乡村经验写作取向相反，不少诗人在相同题材与主题表现上，则着力传达出一种快乐、美好的童年情感体验。例如胡建文的《麻雀，麻雀》、谢小灵的《踢毽子》、阿信的《我们没法从一场春天的游戏中退出来》等诗作，就是这类性质的作品，这些诗作整体上以比较欢快的语调描述诗人们儿时游戏的场景，语言单纯，节奏明快，给读者传递着正能量的情绪体验。

还有部分诗人，偏好书写青春记忆与成长经验。例如，姜念光在诗作《祖国之夜》中运用激情的节奏、精确的语言、生动的想象再现了诗人军旅生涯中的青春记忆与成长经验，令人称赏。李皓的《在雾霾天去见前女友》以甜蜜与惆怅相混杂的

复杂心态，揭示了诗人的一段青春恋情，比喻的巧妙设置，反讽语气的自如运用，展示出作者不俗的艺术功力。陈美明的《当我老了》以时光倒流的假定性情境，用鲜活、到位的语言再现了诗人青春时代的欢乐心态。晓音的《三个喇叭的八角街》刻画了诗人一个青春记忆的片段，青春的美好与八角街的神秘构成该诗颇具亮点与魅力的内容。而刘向东的《微小而又透明的鱼群》与蒋芸徽的《奔走》将记忆的时间与空间拉得更近，它已经超越童年经验与青春经验，指向诗人生命记忆中最深刻最美好的一个瞬间，怀旧的语调，优美的语言与意象，呈现出记忆写作的心灵图景。总之，记忆写作大面积的激发了诗人的经验表达与情感诉求，使得其诗歌文本魅力独具。

向度之三：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

当诗人关注社会现实、时代境遇、历史想象与个体记忆，其书写重点更多的是指向外部世界，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与揭示，体现出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意识，而当诗人向内转，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灵魂状况，其写作便完全内在化了，诗歌写作的现代性特质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近些年来，人性写作倾向颇为盛行，诗人们对人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揭示，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在2016年的人性诗歌写作潮流中，部分诗人侧重表达人性中那些美好的、正面的部分。例如，树才在诗作《文人之死》中通过著名现代作家夏衍临终之前交代秘书去请大夫的细节描述，展示了老一代文人身上那种骨子里对人的尊重意识，这是一种人性之光的闪耀，读之令人悄然动容。李少君的《泄露》则着眼于观察一位恋爱中女性的无意动作，她的矜持与可爱均通过她有意闭上眼睛的动作细节透露出来，诗人对恋爱中女性微妙心态的洞若观火式地揭示令人莞尔。与李少君的《泄露》相映成趣，车延高的《提心吊胆的爱你》用心灵坦白的语言与手法，

表达了诗人对自己女儿的深深热爱以及爱之方式的用心良苦，世道人心的险恶与父母之爱的伟大、无私构成鲜明对比，作品的款款深情沁人心脾。陈泰灸的《夜过淄博，我想起一群美丽的狐狸》利用文人普遍喜欢的《聊斋志异》中的传说，传达了诗人对美丽可爱女性坦率的热爱之情，作品语言的活泼俏皮与意象的鲜活生动有机结合。与陈泰灸的作品相呼应，黄亚洲的《穿过波罗的海，去丹麦》利用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童话故事给读者带来的心灵震撼力，重新构想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与她奶奶的幸福归宿，诗人悲天怜人的博爱情怀与丰富出色的艺术想象，再次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心灵感动。青年诗人聂权的《熟悉》通过偶遇的两个小孩很快彼此熟悉的友好场景的描述，展现了小孩子的天真无邪，人性善的美德与光芒，令成人世界相形见绌。

上述诗人诗作，是对人性中的真、善、美品质的弘扬，而另外一些诗人则倾向于对人性中的负面性与真实性一面予以揭示。陆健的《在江宁》以世人与诗人之间的包容与被包容关系为切入口，通过诗人自身复杂心态的自我分析，凸显出人性的深度，诗作语言的犀利与反讽手法的运用有力地呈现了作品的主题。王桂林的《身体的阴暗如同这世界》则直接以身体欲望为观察点，诗人用富有力度的语言与意象对人性之恶的现代性主题予以了直接而勇敢的呈现。梁尔源的《镜子》通过自己在镜子前不自觉地掩饰自己缺陷的心态的自我剖析，坦诚的自白与人性的弱点互为映衬。冰峰的《一瓶白酒》叙述了二位好友在酒桌上因为小事争吵从此永远断交的真实人生经历，人心的变幻莫测与人性的不可理喻令人唏嘘，此诗的思想深度由此彰显出来。此外，王顺彬的《白乌鸦》、若离的《傻瓜》、田湘的《校花》、张民的《医生与病人》、马慧聪的《人模树样》、师力斌的《抑郁症》等诗人诗作均涉及人性负面部分，诗人们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人性主题的丰

富性得到了完美地展示。

人性写作体现了诗人直面欲望世界的真诚态度，而当诗人主动渴望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与灵魂状况，则其写作便跃升到神性写作的层面了。具体点说，神性写作是建立在人性写作的基础之上，是基于人性体验之上的神性体验、灵幻体验与宗教性体验。简言之，神性写作是对人性写作的完全纯化与全面提升，神圣性、庄严性、超验性是神性写作的主要特征，神性写作这种写作向度在 21 世纪以来的诗坛一直颇为盛行，它是对口语化写作与日常生活写作的必要反拨。

作为神性写作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吉狄马加近些年为诗坛奉献了诸多具神性写作典型风格的精品力作，这次他又为我们带来了诗作《寻找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加》，诗人用表情庄重、精确大气的语言，用娓娓道来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位令人敬仰的西班牙杰出诗人洛尔加的英雄形象，氤氲在字里行间的对于杰出诗人的朝圣心态令人回味无穷。与此类似，艾明波的《拜谒杜甫草堂》也是传达了诗人对于一代诗圣杜甫的朝圣心态（正如爱斐儿一首诗作的标题《朝圣者》所提示的那样）。干天全的《作为诗人的你——致雨果》、李东海的《永远的曼德拉》、熊国太的《革命猎豹——献给菲德尔·卡斯特罗》则将朝圣的目光投向国外那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在崇高、庄严、神秘事物面前的朝圣心态与敬畏心态，是神性写作诗人最为经典的精神姿态。例如，大解的《大海》、陆群的《村庄的神祇或可降临》、李南的《在鼓浪屿草木诗经咖啡馆留宿》、杨北城的《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李永才的《落日颂》、姚辉的《月光》、雨田的《柯鲁可湖》、黄恩鹏的《青海湖》、羊子的《请让开一下》、李浩的《吃与雾》、江合的《4月22日为乌云所作》、度母洛妃的《号角》等诗人诗作，均传达出了诗人们在神圣之物面前的朝圣心态与敬畏心态，而他们的艺术风格因人而异，或

大气，或质朴，或厚重，或空灵，或纯粹，或优美，或深邃，不一而足。

有些诗人，还把他们的朝圣心态与敬畏心态投射到动植物身上。比如，石厉的《老虎，老虎》表现了诗人对百兽之王的崇敬之情，诗作运用庄重的修辞与活跃的想象，将老虎高大威猛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江非的《一只老虎穿过黄昏时的墓园》在艺术风格上与石厉的老虎诗篇比较接近，但立意有所不同。刘立云的《鲸，或者赞美》以空灵的想象与语言，塑造了鲸鱼作为大海之王的威猛形象。曹谁的《美人鱼梦》则以童话般的想象与表现手法，勾勒出了一个如梦似幻的绚丽梦境。而刘以林的《院中大杏树》对一株大植物表现出了神明般的崇拜之心，从中折射出诗人的某种泛神论思想。夏花的诗作《泛爱论》可以视为对刘以林的泛神论思想倾向的呼应性作品，女诗人夏花在作品中宣扬的泛爱论思想与刘以林作品中流露的泛神论思想在最高的意义上其实是同一的。可以说，泛神论与泛爱论是神性写作的思想背景与基本动力，它对人性、人心均有升华之功能。当然就诗歌写作的实际情形而论，神性写作与人性写作并无清晰的边界，它们常常混合在一起，现以诗人程步涛的诗作《读碑》为例，该诗既包含有人性化的情感成分，同时又包含着超逸人性的神性体验，在作品的情感结构中，最终实现了由人性到神性的飞升，这使得神性写作具有深厚的人性基础，而它的艺术合法性由此得以确立。总之，人性写作与神性写作全方位地展示了诗人真实的精神世界与内在层次。

向度之四：口语化写作与修辞性写作

进入 21 世纪，随着大众文化的全面崛起，能够迎合大众文化趣味的口语化写作在诗坛蔚然成风，形成一股新的写作潮流，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说，口语化写作能够反映大众的生存经验，满足大众的阅读趣味，但从诗学层面来看，口语化写作也体现为诗人的一种语言意识与语言态度。当一个诗人有意识地使用口语进行

写作，他就是有意识地建构着自己的艺术风格与诗学理念。从写作人数来看，口语写作诗人数量巨大，难以准确统计，其中很多持先锋写作立场的诗人，往往选择口语进行诗歌写作。也就是说，口语诗人与先锋诗人存在较大的重合成分。

侯马与沈浩波被认为是口语写作的代表性诗人之一，这次侯马带来的诗作《端午节》保持了诗人一贯的日常生活叙事与解构主义手法组合在一起的创作特色，诗作前半程是轻松、流畅、煞有介事的口语叙事，到结尾处则用幽默、反讽的语调完成意义的解构与颠覆，读之令人忍俊不禁。沈浩波的《父与子》展示的是在城市工作的儿子与乡下老父亲会面交流时最为常见也最为尴尬的一幕：父子之间的交流障碍，表面上看是儿子使用的普通话与老父亲使用的方言之间的对接不上，彼此别扭，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父子两代人的城乡文化隔阂与情感距离，诗作娴熟的口语表达与无奈自嘲的语气的并置，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与心灵共鸣。荣斌的《女儿》展示了一位城市父亲与叛逆女儿的关系纠葛，父亲对女儿的耐心与爱心最终败给了未成年女儿的我行我素，诗作的戏剧性场景设置和对语感的良好把握，让该诗颇具可读性。总起来看，幽默、俏皮是口语诗歌文本常有的艺术效果。比如，赵思运的《陈鲜花》运用轻松、活泼的口语，为读者披露了女诗人安琪的一则趣闻轶事，诗作通过善意调侃女诗人安琪乡音太重常把诗人“陈先发”念成“陈鲜花”而达到幽默的阅读效果。此外，反讽手法、解构精神也是口语诗歌的鲜明艺术表征。例如，马非的《爱》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比喻，表达对于生活本质的看法，诗人对于生活本身暧昧不明的态度与内在微妙的自我反讽，才是该诗的出彩之处。与此相似，青年诗人左右的《许愿树》运用特别通俗的大众化语言，表达对于大众的祝愿之意，但是文本结尾处调侃、反讽语调的出现，顿时让文本的原有意义实现了自我解构，一种后现代性的审美趣味油然而生。除

了前面提及的诗人诗作，林之云的《那只猫》、李强的《打铁》、卢卫平的《我为什么总有这样的担心》、北魏的《我的保姆角色》、李宏伟的《你是我所有的女性称谓》、水笔的《爱是力气活儿》、老德的《稻草人》、王彦山的《这几年》、黄海的《丧》、牛红旗的《三年了，又三年了》、光双龙的《道歉》、黎权的《农贸市场》等诗人的诗作，均是在思想艺术方面各具特色的口语诗歌文本。

与口语写作相比，修辞性写作无疑更能体现出诗人对于语言艺术的重视，而且，追求修辞效果的诗人，往往追求词语自身的想象力，同时更倾向于选用书面语。修辞性写作，或者词语写作，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华语诗坛新的美学潮流，它反映了现代汉语诗人对于修辞与技艺本身的极端重视。一般说来，修辞性写作主要围绕着词与物的关系具体展开，也就是说，诗人在诗歌文本中一方面应体现出对于词语的想象力，一方面应体现出对于事物本身的想象力，以及词与物双重缠绕的综合性想象力。

作为在修辞性写作领域开风气之先的诗人，欧阳江河的诗作《墨水瓶》含义深远，该诗不但具有诗学追求上的隐喻意味（让人产生对应性的联想），而且在文本内部，诗人说话的语调非常雄辩，词语智慧组合，意义自由衍生，启人心智。同样以修辞与技艺著称的诗人臧棣，他在《人在墨西哥》一诗中以从容经营其语言节奏、说话方式与文本结构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深厚诗艺功底不难为人感知。林雪的《坐堂医》与胡弦的《玛曲》在语言方式与艺术风格上与臧棣的《人在墨西哥》颇有几份神似，但三位诗人身上还是保留着各自的艺术个性。高兴的《词语》、梁雪波的《词语里的人》、瘦西鸿的《拆字游戏》则共同彰显了诗人们自觉、强烈的词语意识。简言之，高兴的诗作追求词与物的对应，想象辽阔，气象庄严；梁雪波的诗作修辞精准，情感色彩浓烈；瘦西鸿的诗作则语言活泼、机智，

充满奇思妙想。此外，徐俊国的《散步者：致修辞的拐弯》、南鸥的《阿瓦小镇》、杨志学的《在龙门石窟》、侃侃的《我们说到了光》、瓦刀的《光阴谣》、雪鹰的《虚无》、王西平的《前世为花的讯息》、田晓华的《手术，就是刀中有术》、牛放的《杂技》、远心的《拒马河上》、苏明的《读友人诗选》、戴潍娜的《雪下进来了》等一批诗人的诗作，均是在修辞与技艺方面值得称道的文本。

向度之五：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

一个诗人的修辞技艺再怎么高超，如果其文本缺乏思想性，或者说，如果一位诗人没有建构思想的能力，那么他（她）就不大可能成为一位杰出的现代汉语诗人，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与杰出的诗人同时还兼具哲人或思想者的身份。所谓的智性写作，是指写作者在其文本中能够传达对于生活与人生的理性思考与智性感悟，努力从生活现象中发现与提炼哲理；而所谓的形而上写作，则是指写作者在写作中直面生命现象而展开形而上的思考（即纯粹的哲思）。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之间的界限并不鲜明，只不过相对于智性写作而言，形而上写作显得更为纯粹与抽象一些。

刘川的《水瓶》展开了一场佛祖与弟子阿难的想象性对话，阿难对伟大与渺小的顿时觉悟展示出了诗人禅宗式的心灵智慧。王黎明的《忏悔诗》从死亡想象的角度，揭示出人性虚伪的一面，诗人的认知方式，非常接近禅宗式的顿悟。杨角的《花生米定律》也是通过诗人自己的感悟，对生命难以避免衰老与死亡的现象，产生了清醒、理性的认知。李骏虎的《生活的方向》态度鲜明的思考生活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直抒胸臆，发人深思。黄梵的《中年人的胡子》表现的是时间主题，诗人从胡子的角度巧妙切入，对于时间的压迫与自己的中年心态进行了颇为理性的自我分析，展示出诗人随时间而来的生命智慧。王晟的《恶》展示的是恶势力